

從人類的生生活動看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

許永河*

摘要

本文從歐洲封建制度崩潰後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探討政治經濟學的起源，探索經濟發展的時空背景因素對財富累積與分配、權力累積與分配間的互動關係，並就人本的角度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關鍵字：研究方法、政治經濟學、所得分配、權力分配

壹、緒論

「政治經濟學」一詞出現在歐洲十七世紀封建制度崩潰之後，其出現與私有財產制的逐漸確立、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市場經濟的勃興有密切的關係。十八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學者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對政治經濟學的討論範疇著重於國家財富之生產、分配以及經濟成長等問題，然而自「邊際革命」之後，經濟學的探討方向開始著重效率分析，亦即在已知的市場結構、已知的技術、已知的資源賦藏量，以及已知的消費者偏好等條件下，探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此後經濟學的研究主流變成借助數學分析的效率問題研究，視制度面因素為已知，經濟政策被視為有礙完全競爭及市場機能實現的干擾性因素，經濟學的研究變成「純經濟學」，而不再具有政治經濟學的色彩，而「政治經濟學」的意涵對主流經濟學者而言亦漸形陌生。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係希臘文之“politico”及“oikonomiko”兩名詞之組合；前者係指國家（polis）之治理，而後者則指家庭經濟事務（oikos）之審慎經營管理。因此就語源的意涵來看，由國家事務治理之「politico」與家內經濟事務經營之「oikonomiko」兩者合稱「政治經濟學」，是則「政治經濟學」一方面既是處理國家大事之學，另一方面又是處理家庭經濟事務之學，到底其意涵所指為何，難免令人疑惑。

十八世紀以來許多大思想家對「政治經濟學」一詞的意義已有甚多的討論，例如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政治經濟學論』中認為經濟學「Economy」一詞源自希臘文 Oiko-nomia，原意為合宜且明智地經營管理家內成員間共同利益之事，但後人將 Oikonomia 擴展到政府或國家這個大家庭之層次，認為經濟學處理的是經世濟民的家國大事。對於這種看法，盧梭並不同意。他認為家庭財產的經理與國家財富的經理

不可相提並論，蓋家庭與國家經理者的權力來源不同，經營管理的目的也不同。就權力來源來說，一家之主的族長或父親，其在家庭內的權威是來自自然的關係，然而國家的權力則來自法律或公眾的同意。其次，就管理的目的來看，家庭族長儉樸自持，對家族財富審慎經營管理的目的是希望未來有一天必須分配家產給其子女時，其子女可因其今日的妥善經營而免於貧窮之苦。然而，國家治理的目的在維持統一，而非為未來的分裂作準備，因此國家經濟的治理或國家財富累積必然不以分裂的需要為著眼。更有甚者，家庭族長關心其子孫的幸福，但國家的統治者卻未必如此；歷史上不乏為自己的幸福而犧牲人民幸福的統治者，因此，國家的經理者的心態並不必然與家庭經營者的心態相同，將私經濟的管理原則擴展到國家的經營並不適當（Rousseau, 1775）。

十八、九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內涵的見解又與盧梭不同。亞當斯密（Smith, 1776）認為政治經濟學係政治家之學，這門學問具有兩個獨特的目標：其一為一國國民提供豐富的收入或生存物資，或使民眾有能力自行供應其收入或生存物資；其二為提供國家足夠的收入，以滿足公共服務開支之所需。李嘉圖（Ricardo, 1817）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是要找出社會財富的分配法則，他認為地表上的一切產出，最後將在地主、資本家及勞動者三種階級間作分配，然而在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產出在這三種人間的分配比例並不必然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首要課題便是找出支配產出在這三種階級間分配比率的法則。

都柏林大學首位政治經濟學教授隆費德（Mountfort Longfield, 1834: 1）認為政治經濟學所討論的是不同國家財富之創造、累積、分配和消費之原理或法則，而財富則的內容則包括整個社會的生存物資，不論是生活便利品或者是奢侈品，都是財富。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 1844）則認為政治經濟學之於國家，猶如家庭經濟學之於家庭，均是有關消費與供給的科學，並主張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是探討決定商品之生產、分配、交易，以及消費的法則。

本文第二節從歐洲封建制度崩潰後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探討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兼論經濟發展的時空背景因素對財富、權力及價值體系形成之影響，以及各該因素對政治經濟學發展之影響。討論焦點著重於財富分配與權力分配的關係，以及財富累積與權力累積之關連，文中將回顧從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間歐洲政經思潮的發展，藉由時空關係的觀照與回顧，探討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及沿革。

其次，在第三節將探討政治經濟學探討的對象及研究的本質。在政治經濟學發展百餘年之後的今日再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方法，主要目的在掌握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本質。政治經濟學是人類生生活動現象的研究，其研究如離開人的生存問題即失其意義，若不能掌握人類生生活動的特質，將為多變的現象所炫惑而難以掌握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因此，本文嘗試自人類在時空環境下的生生活動來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並對如何掌握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提出管見。

貳、從歐洲的歷史發展脈絡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本文緒論中引述了許多古典政治經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一詞的定義，然而看完各家的定義似乎仍然無法明白到底政治經濟學探討研究的內容是什麼。因此，本文擬回溯中世紀以來歐洲歷史的發展過程，在歷史的時空環境中探索政治經濟學的出現與發展，期望因此有助於疑惑之釐清。

歷史的追尋，要從中世紀的歐洲開始。¹西元 476 年羅馬帝國因蠻族入侵而崩潰，統一歐洲大陸的政治力量瓦解，隨後一千年左右進入所謂的黑暗時期（the Dark Ages）。古羅馬帝國所

¹ 有關中世紀以來歐洲經濟社會之發展，請參閱 Palmer, Colton and Kramer (2002: Chap. 1-3); Heilbroner and Milberg (2001: Chap. 2-3)。

建立之政治、經濟、法律及社會架構在蠻族入侵後均告瓦解，歐洲人爲了安全與自保，在軍事和政治面逐漸出現了合約互保的封建制度，在經濟面則因城鎮沒落，羅馬帝國的貨幣亦失其普遍接受性，所有交易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而與封建緊密結合的莊園遂成爲主要的經濟活動中心。由於安全問題與陸路交通的不便，西元十世紀之前的歐洲，除了鄰近的莊園間出現有限的交易活動外，大規模的固定市場交易活動已經式微。

西元十世紀左右，基督教會對歐洲社會的影響力逐漸增加，教會成爲封建制度的最大領主之後，不僅影響歐洲人的精神生活，其對世俗生活的影響力亦因政教合一制度而增加，教會的規矩（the Cannon law）成爲約束世俗經濟行爲的準則，而教會對世俗經濟活動的教化係以宗教道德情操爲基礎，強調平等、公平與公義等觀念。

在封建制度初期一直到十三世紀末，交易活動範圍有限，人口成長也甚緩和，較大規模的交易活動通常僅見諸於宗教節慶的慶典市集。封建的社會階級和政治結構都非常僵化，社會階級間的垂直移動幾乎不可能出現；主要的經濟活動是農業的生產活動，而農業的生產與分配係受風俗習慣所左右，生產技術未有重大突破，天災與飢荒使產出呈不穩定的狀態，產出的增加大抵僅滿足人口增加之需。在如此僵固而靜態的社會中，根本無所謂政治經濟學議題出現之可能。

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十四世紀以後逐漸發達的造船與航海技術，帶來東西交流及遠程貿易的增加，此一發展改變了歐洲人的視野與生活。貿易活動的範圍及市場的規模逐漸擴大，經濟活動的內容也不再侷限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爲市場而生產的農業資本家逐漸出現，而商人也逐漸成爲社會的新興階級。商人階級利益與貴族階級利益的糾葛互動，爲近代政治經濟學之開端。

歐洲的封建制度在十三世紀時達到最高峰，然而自十字軍東征後，封建制度逐漸瓦解，爲歐洲的政治及經濟開啓了新的紀元。由於遠程貿易及交易活動的蓬勃發展，貨幣逐漸成爲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貨幣的盛行也使附庸對領主的勞役貢輸開

始出現以金錢給付取代及身勞役的現象，再加上十字軍東征末期，出現有錢的佃農或附庸避開戰場的危險而雇人代為出征，領主不僅接受此種勞役貢獻方式的改變，也偏好以戰鬥力強盛的職業性傭兵來取代戰力薄弱的農民，因而使原先封建制度的精神逐漸喪失。

除了制度本身的改變之外，天災及客觀環境的改變亦使封建制度漸難維持，並自十四世紀開始逐漸加速崩解。1347年十月開始，歐洲出現鼠疫及肺炎等瘟疫流行的現象，短短五年間，瘟疫的蔓延使當時歐洲的人口少了三分之一，²人口的凋零以及農業生產的衰退，使得原先封建制度的領主附庸關係更加難以維持。而在封建制度逐漸崩潰的同時，西班牙、法國及英國出現強而有力的君主，取代了封建領主成為地區性的統治者。這些君主不乏原先僅為小領主者，因為屢戰屢勝，以致鄰近同文同種領地的小領主及佃農逐漸自動歸附倚靠，以求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這些君主一方面帶頭向大領主抗爭，拒繳賦貢，另一方面又向其轄地內的人民徵稅，用以維持保安的軍隊及統治的開銷，此一新的政治制度逐漸取代封建制度，而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開端。到十六、七世紀間，政教亦逐漸分離，基督教已無法再干預世俗的宮廷事務，退而專心對世間精神生活之教化，君主集權為型態的民族國家逐漸成為歐洲的主要政治制度。

封建制度的瓦解，將歐洲人從封建的社會階級桎梏中解放出來，而基督教退而專司精神生活的教化，也將歐洲人自宗教對經濟活動的束縛中解放；中世紀末期以來的農業技術創新，使得農業部門產出提高，出現社會剩餘，而十字軍東征所帶回的古希臘典籍及東方的文明，讓歐洲人重新追尋人的價值，開啓回歸自然、追尋個人自由的思想。這些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間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改變，為日後的政治經濟學發

² 見 *The Black Death: Bubonic Plague*, 網址：

<http://www.byu.edu/ipt/projects/middleages/LifeTimes/Plague.html>

展提供了社會基礎。

一、重商主義的時空環境與政治經濟學思想之出現³

從歐洲歷史的發展來看，封建制度的瓦解、宗教的退位、民族國家的出現、國家間權力的競爭、商業的勃興，以及商人階級的出現等因素是政治經濟學萌芽的歷史條件，而重商主義則是中世紀以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典型。

自給自足的封建體系逐漸瓦解後，先是農業資本家在農業部門出現，繼而當市場規模逐漸擴大，交易活動逐漸熱絡時，商業資本主義乃逐漸形成。中世紀以來的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城鎮及城市，逐漸發展成為商業活動的中心，商人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加重。而西元 1500 至 1650 年間海外殖民掠奪，導致美洲的黃金白銀大量流入歐洲社會，結果是物價大幅上漲，導致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效果。原先的權貴，如國王、封建貴族及教會等，均為固定收入者，其財富因通貨膨脹而縮水，而商人產品的售價因為可依通貨膨脹而調整，實質所得不受通貨膨脹影響，故其財富因通貨膨脹及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結果出現社會財富重分配的現象，社會財富由原先的統治階級移轉到商人手中。國王或貴族面對實質收入的減少、國家競爭的軍需支出以及海外探險開支的節節增加，府庫日漸拮据，為了應付入不敷出的開支，不得不向商人借款，商人對政府或政治事務的影響力因此而增加。

嗣後 1650-1699 年間，美洲的貴重金屬幾已被掠奪一空，流入歐洲的黃金白銀大幅減少，而歐洲國家卻因對東方絲綢香料的需求而使黃金白銀流出到亞洲國家，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過去歐洲人因黃金白銀氾濫衍生的通貨膨脹而煩惱，現在卻因金銀的流失引發的通貨緊縮而憂心。王室及其財務大臣將

³ 有關重商主義之時空背景，請參閱 McNally (1994, Chap. 1) 及 Palmer et. al. (2002: Chap. 4-6)；重商主義思想之討論，請參閱 Blaug (1985: Chap. 1)。

黃金白銀的庫存多寡做爲國家財富多寡的指標，而商人追求利潤的目的即在累積黃金白銀以累積財富，商人對財富的看法與王室的財富觀念不謀而合，因此商人乃藉機提出保護本國商人的商業利益即是增家國家財富的主張，形成了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間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的邏輯甚爲簡單明瞭，他們認爲商人獲利，即是國家得利；商人賺得黃金白銀，即是國家財富的增加。因此國家提升本國商人在國際貿易上的競爭能力以賺取外國金銀，不但增加本國財富及政府之威望，也是削弱對手的有力手段。重商主義視財富的競逐爲「零和的競爭」，由於全球金銀的存量一定，在金銀累積的競賽中，如有一方得利，必有他方損失。

因此，在重商主義盛行的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主流思潮主張維持強而有力的政府，並主張政府應積極干預經濟活動，以增加本國商人的競爭力、減少外國商品在本國的競爭力，並應積極鼓勵出口、限制進口，藉此等手段來維持貿易順差，賺取外國的金銀財富。

重商主義的政策主張是以犧牲廣大消費者利益來達到商人階級利益的實現，也是階級利益與當權者利益掛勾的一種運作。重商主義的時代雖無政治經濟學之名，但卻清楚顯示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實質，亦即財富分配與權力分配之互動關係，以及私人或階級利益與當權者利益的勾結現象。

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時空環境⁴

重商主義之政經思潮主宰歐洲百餘年，其雖有政治經濟學之實，卻無政治經濟學之名。政治經濟學一名之出現，大約自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出現在法國及英國。

歐洲社會經過一百餘年興盛的商業活動及經濟成長，消費能力增加，市場規模亦告擴大。自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間發生

⁴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時空背景，請參閱 Palmer et. al. (2002: Chap. 4-6) 及大英百科全書：網址 <http://www.britannica.com/>。

在英國的圈地運動不僅使農業部門的生產方式改變，而且使產業部門的生產內容及組織生產的方式改變，也改變了中世紀以來英國的社會結構。

黑死病之後，由於人口減少，農業部門的工資幾乎飆漲了兩倍。英國的貴族及政府乃採行一連串的措施，意圖壓低工資至瘟疫發生前之水準，另封建貴族為填補因人口減少所導致的收入下降，也試圖提高佃農的貢輸及佃租，因而引發 1381 年的農民革命。此次革命結果農民之主張雖未能完全實現，但農民的佃租條件明顯改善，不僅租金穩定，租期亦長，農民的相對所得分配因而改善。

1500-1650 年間歐洲的通貨膨脹，使得英國的糧食價格飆漲，以英國愛丁堡（Edinburgh Town）為例，1495 年一盎司麵包價格為 0.0727 便士（penny），但在 1648 年同樣重量的麵包價格則變成 1.5000 便士，其價格為 1495 年之 20.63 倍。⁵穩定的低地租以及飆漲的農產價格，使得許多佃農得以累積剩餘。這些經濟情況較佳的佃農因而有能力購買小筆土地，並投資牲口之畜養以獲取肥料來改善地力，增加產出以供應市場的需要。這些農業資本家（yeomen）的出現改變了封建制度的社會階級架構，也使農村所得分配出現富農與貧民的兩極化現象。而此種農村所得分配兩極化的結果，亦使得圈地運動得以大規模進行。此時貴族藉機提高佃農的佃租，許多無力繳交佃租者土地便遭地主收回，變成無地可耕，僅能受雇於他人耕種的工資勞動者。而貴族將收回的土地圈起，整片租予農業資本家雇工經營，於是封建的農業生產體系出現地主、資本家及工資勞動三類人，全部的產出乃在這三類人間以地租、利潤及工資的型態作分配。

⁵ 請參閱 *Edinburgh Town Council Statute Prices; Wheatbread, 1495-1681*，
網址：<http://www.ex.ac.uk/~ajgibson/scotdata/prices/edstat2.html>。
另請參考 *Wages and the cost of living in Southern England*
(London) 1450-1700，
網址：<http://www.iisg.nl/hpw/dover.html>。

十五世紀以後英國國內的政治發展，也使新興得農業資本階級找到參與公共政策的管道。十五世紀中葉都鐸（Tudor）王朝時期，⁶王室為對抗傳統貴族的制肘，因而提高地主在國會的席次，並降低其土地稅賦，此為地主階級參政之契機，也是英國地主階級利益與國家當權利益者掛勾之開端。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地主階級的政治地位更加鞏固，因而藉其國會代表之地位，掌握國家立法機器，通過許多有利地主之法案，放寬土地持有面積之限制，進行新一波的圈地運動。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初，是英國資本原始累積的開始，而此一原始累積是因農業部門土地私有財產權的確立，以及土地產物市場價格提高所帶來財富累積的結果。農產品價格提高帶來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影響了階級間的財富分配，財富的分配影響權力分配，土地私有財產權之擁有者透過立法機制擴張其對政治事務的影響力，尋求保障、擴張其利益。綜合前述，我們瞭解十七世紀的英國是革命的世紀，也是農業資本家出現的世紀；英國國內政治的波動以及農業部門的轉型，使得國家政策偏向於保障農業資本家或地主利益的結果。

發生在英國農業部門的「資本原始累積」過程，使許多原先農業部門的直接生產者從農業生產活動中被釋放出來，這些人原先是佃農，現在無土地可耕，變成需要靠出賣勞力在地主的田中或鄉村小工匠舖賺取工資維生的工資勞動，而後變成新興產業中心的工資勞動。農業部門的原始累積直接造就了農業資本的壯大，並創造了新興產業中心的普羅階級（proletariat）。

然而英國十八世紀農業資本家的出現並非完全是因市場擴大及專業分工的需求而出現，讓農業資本出現的主要因素是土地私有制度的逐漸確立，以及土地財產權凌駕封建的風俗而使農村的直接生產者變成赤貧的普羅。⁷隨著農村專業生產程度

⁶ 都鐸王朝（the Tudor dynasty）統治英國的時期為西元 1485-1603 年。

⁷ 中世紀以來，農村的佃農除了耕種租地外，風俗亦允許他們到公有土地（common land）拾取材薪、放牧牛羊、摘取果實，以及捕魚

的加深，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業部門的原始累積為新興的產業提供了勞動力、資本，以及初期產業發展所需的市場。

『國富論』出版前的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由糧食價格高漲導致勞動成本節節高昇，且因市場規模擴大，產品的需求已非傳統手工製造業所能提供，因此新興產業部門應運而生。面臨市場競爭以及追求資本累積，生產者乃不斷尋求新技術、新設備，以求降低成本。新技術所帶來的組織生產方式的變革便不僅是經濟問題或技術問題，而且產生了许多社會問題，這些都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時空背景。

三、英法兩國最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

今日所稱之政治經濟學，最早出現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及英國，然而由於兩國的社經情況不一樣，因此其所論述的內涵也不盡相同，茲予分述如後：⁸

十七世紀的英國是農業資本主義崛起的時期，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不僅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結構，也使英國政治權力分配的結構改變，結果是農業資本或地主階級對公共政策影響力增加。在農業生產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地租是社會剩餘的主要來源，而社會剩餘歸誰所享、歸誰所用，不僅關係到不同社會階級間的財富分配狀況，也影響到經濟的成長。因此十八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者，如亞當斯密及李嘉圖等，所探討的焦點是剩餘的產生過程、地主階級因私有財產權而得以對社會剩餘排他性獨享的現象，以及此一現象對經濟發展及政治生態所生影響。

等。公有地的使用不僅是約定俗成的一種佃農權利，前述公有地的權利亦構成農民重要的輔助所得。圈地運動不僅時許多佃農失去耕種土地的機會，土地私有財產權的主張亦使許多原本的公有地被劃成私有放牧地，原先的佃農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⁸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之討論，請參閱 Blaug (1985: Chap. 2-5)。另法國重農學派之思想，請參閱 Landreth & Colander (2002: Chap. 2-3)。

十八世紀另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是在法國出現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重農學派的分析同樣是以農業經濟為骨幹的政經分析，然而法國國情與英國不同，其分析的焦點乃與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有所差異。法國當時集權君主因戰爭及王室開銷而致財政收支日益惡化，除了一方面向新興的布爾喬亞商人告貸以為支應，另一方面亦以增加貴族及農民的稅賦來支應。然而貴族往往將其稅賦轉嫁到佃農身上，因而出現全國稅賦幾乎由農業部門負擔之現象，結果是農民貧困加劇，而農業投資之資金耗竭，而農業部門之剩餘及中產階級的財富轉移到國王及貴族手中，用於非生產的用途。法國王室藉租稅增加作為改善其財政收支的主要手段，竭澤而漁的結果，使法國政府的財政及整體經濟因而出現危機，最後危及王室政權的安危。

就十八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源頭來看，其所關心的均是社會財富的來源與財富的分配，社會剩餘（或儲蓄）的創造以及剩餘的支用方式對經濟發展、國家財富及社會階級福祉之影響。然而兩國的歷史發展及政經情況不一樣，因此便發展出來內涵不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英國政治經濟學者關心的是地租及其所衍生的長期經濟發展與階級間所得分配情況動態變化的議題，而法國政治經濟學者所關心的是租稅制度的問題，以及稅賦及其轉嫁所衍生對經濟健全的威脅及對長期經濟成長的影響。儘管這兩個政治經濟學源頭所強調的分析焦點不一樣，但他們的分析有幾點共同性：

1. 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均是以農業經濟體系為骨幹，分析社會財富的生產、再生產以及分配的相關問題。
2. 其分析中均包含三個社會階級架構，⁹並討論階級間財富的分配、社會剩餘的支用方式對經濟發展、階級間權

⁹ 法國重農學派之三個階級為生產性階級之佃農、非生產之地主與工匠，商人及貴族家中之僕役均被列入非生產性的階級，併入工匠之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則將社會階級分為地主、資本家及農業部門的工資勞動三種。

力與財富分配的連動關係，以及社會安定的影響。

3. 兩國的政治經濟學均係對十六世紀以來盛行的重商主義政經主張的反動及挑戰。一反重商主義所強調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及對商人的保護以收獨佔利益，法國的重農學派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均強調自由而不受政府干預的經濟。
4. 英法兩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雖均反對重商主義制度下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的現象，但他們並不主張政府應完全退出經濟活動之外。亞當斯密強調自由放任思想，認為自利心的發揮可使社會福祉最大化，政府並非應完全退出市場，而應維持市場自由的實現、執行法律規範，保障社會秩序，避免市場遭到利益階級的干預及扭曲，維持社會的繁榮與和諧。法國重農學派則強調經濟活動應與自然相應，與自然相應的農業經濟活動才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工匠及商人的經濟活動均被視為非生產性勞動，他們僅能以勞力維持自己生活所需，無法創造剩餘，累積社會財富。重農學派反對的是重商主義者對國家財富的主張，並非反對政府的存在，故其雖強調與自然相應的經濟活動才是財富的來源，但主張唯有集權專制的政府才能保障社會多數人的利益，免除少數利益階級對公共利益之威脅。

參、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思考

當我們回到十八世紀歷史的時空場景中來看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意涵也就顯而易見，對名詞定義的爭辯便顯得沒有必要了。從前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源頭來看，政治經濟學可以說是社會財富之學（the theory of social wealth），而其探索研究的內容，無非是與社會財富的生產、分配及消費相關的議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意涵，在現今的時空環境下是否仍然適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否因時空背景的改變而

有不同？

從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源流來看，1891年馬夏爾(Alfred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發表後，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內涵便開始改變，經濟學的研究，不再討論前述生產、分配、消費與成長關連的議題，轉而著重經濟效率與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探討。此一轉變，不僅是研究方法的轉變，而且是對作為研究基礎的社會架構看法的分歧。迥異於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有關財富、階級與經濟成長的動態關連分析，馬夏爾以後的所謂「新古典經濟學」擺脫複雜的階級互動對精準的經濟分析所帶來的困擾，假設社會架構為經濟分析的許多已知條件之一，在「其他情況不變」、「理性行為」及「資源賦藏量」已知等假設基礎上，進行受限情況下資源配置效率的科學分析，其目的在探討限制條件下滿足最大化及福利最大化的條件。經濟學的研究從此變成「純經濟學」，其假設不變的「其他情況」，包括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市場結構、社會架構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這樣的純經濟分析雖有其獨特性，但已使經濟學的研究方向逐漸偏離其所賴以建立理論的社會基本面，與早期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社會現象的研究分析大異其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再談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向，並非要回復到過去的科學分工不仔細的年代，將古典政治經濟學討論的架構完全套用到今日的環境，而是思考探究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政治經濟學研究本質是否有變與不變之處。

若以財富分配與權力分配作為思考的重心，比較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特質，我們發現傳統社會中影響權力與財富分配關係的是威權或傳統價值觀，一個人除非有能力顛覆威權或傳統，否則只能在既定的社會架構中接受現狀。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影響財富和權力分配的是權力與財富本身，傳統價值與威權的影響力已逐漸式微，而私有財產權制度和現代的所謂民主選舉制度，為財富擁有者開啓了一條管道，使他們得以以財富來影響權力分配，再以所獲得的權力去影響公共政策，進而保障並增進本身的財富。

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高低不再是由風俗習慣或封

建制度所決定，而是個人的成就來決定的。成就的意義雖然因人而異，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成就往往是以賺取財富的能力來衡量的，因此理財積財的能力成爲個人社會聲望的重要指標之一。擁有財富者往往擁財而貴，也因財富所帶來的社會地位而對公共事務或公共議題產生某種程度的意見領袖地位。因此，財富與權貴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兩股互爲表裡的力量，「以權謀財、以財逐權」成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之一。在這樣特質的社會中，富人固然爲自己的利益而對財富權勢汲汲鑽營，經濟地位居劣勢者亦希望藉由努力工作累積財富來贏得同儕之尊重。

因此，儘管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時空環境與今日迥然不同，但所有政治經濟學的議題均脫離不開「人」的問題，離不開人在不同時空環境的社會關係中謀求權力累積與財富累積的互動關係。職是之故，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本質及研究方向，擬從三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一）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體：人及人的生存活動現象；（二）現象分析所應具備的基本素養；（三）現象的邏輯分析，以「新政治經濟學」爲例。茲就前述三個思考層次析論如次：

一、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體：人及人的生存活動現象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體是人，研究的對象是人的生存活動現象，也就是人的爲了生存而產生的競爭或合作的現象。人的生存活動現象，可以從個體面及整體社會面來思考。

（一）、個體的生存活動及生命需求

從個體面來看，人的生存活動在尋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以及生命延續之所需。生命最基本需求滿足後，進而有種族繁衍的需求，以及張羅繁衍所需物質的努力。其次，基本的生命需求滿足、生命的安全有保障之後，乃進而求幸福、追求

生活的品質。而生活飽足無虞，不必再為生活所需奔波忙碌之後，才有餘暇進行較高層次的精神活動，創造社會制度，探索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宇宙的關係，進而思考形而上的生命存在意義等問題。

就個體的存在而言，生命安全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物質的不虞匱乏固然是生命延續的安全保障，但生命不受外力的侵襲威脅與也是安全的基本需求；求活、求安、求延續、求壯大乃人類生生活動背後的基本動力。因此，以生存為核心來說，生存所需物資的追求與武力防衛的需求是任何時空環境下生生活動所共同具有的不變因素。¹⁰

人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基礎單位，個體生命存續的基本需求是一切人類活動現象的基礎，瞭解人類生生活動的基本動機，有助於政治經濟學問題核心的掌握，然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本質不能侷限在個體活動中，而應在人類群體的生存活動中開展。

(二)、人類群居的生存需求

生存問題固然是任何時空下均存在的人類共同問題，但高度發展的文明以及社會制度的創造則是在生活飽足無虞後才會出現的產物。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或許可以不假外力，但每個人的天賦能力有差別，互助分工無疑可提高個人的物質獲取量，提高滿足程度，群居社會經濟活動的社會關係便開始出現。此外，為了生命的安全，互助合作抵禦一切威脅生命的攻擊，增加防衛的力量，可以增進生命安全度，因而形成武力安全的社會關係。

人群居的現象一旦出現，個人生存所關切的物資與武力防衛問題變成集體的問題。集體生存所需物資如何創造、如何分配，便成為集體生存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集體防衛的義務分

¹⁰ 幸福的追求或生命意義的探尋也是亙古時空中不變的因素之一，但此類問題屬於生命哲學的內涵，非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對象。

擔與權利分享，亦形成問題。此時，對制度或權威的需求開始出現。

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出現後，合作中有互利，但互利中又有各自利害的衝突，為了解決衝突，可以遵循共同接受的一些習慣來排解紛爭，也可以訴諸武力解決，但也可以訴諸權謀，善用現勢，尋求同儕的奧援，創造有利的條件來達到目的。因此，對人類的生存活動或生活現象的探討，不能僅僅討論個體的活動面向或行為動機，還應思考個體與群體互動的動態社會關係中規範或限制社群活動的風俗、法律或制度的形成。

(三)、政治經濟學：人類群居生存活動現象的研究

以人類的生存活動為核心來看，人在群居的生活中生命幸福的追求存在一個很難調和的矛盾問題，亦即有我與無我的矛盾。從個人生命的存在來說，需要「我存在」的感覺，在環境中凸顯自己，區隔我與他人，藉自我定位（identity）來肯定生命的存在；然而人是群居的社會性動物，在群體中的平安幸福又需與環境融和，這需要他人對自己的接受與認同，而為了讓他人認同，往往不能在環境中逆勢而為，不能過度凸顯自我，有時恐怕也需掩藏自我，或沒有自我。人在群體生活中一方面要保有自我，另一方面卻又不能過度彰顯自我的矛盾，不僅顯現在社會行為中，也是集體社會現象多變難以清楚掌握的根源之一。因為集體幽微的心理變化很難瞭解，因此想要分析人類生存活動的現象便增加許多困難。

因此，如果從人類的生存活動現象來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我們可以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跨科技整合的研究（inter-discipline study），它涵蓋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歷史、法律、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學科，這些學門的研究都可以對人類社會的公共議題提供分析的切入點。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基本素養來要求學者涉獵前述學門，是無可厚非之事，但現實的限制是沒有人可以窮其一生的精力通曉前述學

科之一二，以這個角度來看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似乎會令人望而生畏。因此，對政治經濟學本質擬進一步的分析，以期能掌握研究的核心。

從人類的生存活動現象來看，活得下去與活得更好的追求，是亙古時空人類生存活動的基本動機。前小節中討論了個人生存的需求以及群體生存的基本需要，我們得出幾點結論：

(1) 人的生存活動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2) 生存需要物資來滋養生命，也需要武力來保護生命的安全；(3) 群體的經濟互助與安全互助是讓人活得更好所不可或缺，然而群體生活隱含了個體利益的競合與衝突；(4) 利益紛爭需要制度或威權 (authority) 來仲裁，威權可能是共同接受的風俗習慣，也可能是宗教的力量，但也有可能來自武力衝突中的勝出者。不論其出現的原因為何，威權是一種制度，它規範了群體的秩序、決定社會生存物資的分配與消費，也決定保護與被保護的社會關係。

生存問題、生存物資的生產、生存的武力防衛以及威權在人類歷史的不同時空中均會出現，但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必須要人類社會發展出現某些客觀條件，使得個人能夠影響威權，也有適當管道可以持續影響威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才會出現。

人在飲食無虞、生命安全有保障後，才會產生較高層次的文明活動，創造社會制度。因此，政治經濟學出現的時空條件之一是一個社會的發展已臻於穩定，有足夠的能力生產滿足其成員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資，且尚有餘力能創造出超過基本生活需要的社會剩餘，社會剩餘能夠去養活一群不必從事直接生產的人口。

然而歐洲中世紀之前的社會如羅馬帝國或希臘文明均有威權，也有高度的文明，也能創造高過全體民眾社會生存所需的剩餘，卻無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其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社會中雖有經濟分配的法則，也有威權，但決定物資分配或財產分配法則的社會風俗習慣、道德教條、宗教的規範，¹¹或者是集權

¹¹ 中世紀基督教的思想主導了歐洲的世俗生活，當時基督教的教會

統治者的約束，在這些社會中，生產的決策是社會習慣所左右，分配是威權所決定，在僵化的社會體系中，個人無法逾越這些約束，而社會架構也不容忍個人的意見挑戰威權。在這些社會中，不是生產的人口思考的問題是宗教、政治或哲學的問題，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受習慣所左右，對經濟行為或經濟現象的探討，既無必要也空間。這些社會雖有威權或風俗來決定生產或基本需求滿足的分配方式，且有能力創造社會剩餘，然而個人對生產與分配並無表達的空間，這樣的社會架構下並無政治經濟學開展的可能。

因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其時空的背景條件必須這個社會已有能力產生社會剩餘，且個人對組織生產的方式及支配產出的方式均有自主權，而對產出的分配亦有決定權之時，才會出現。在這樣的社會，在經濟面各個人爭奪的不僅是基本生存物資而已，尚且包括超出基本需求的社會剩餘。剩餘此時不單存是生存的憑藉，而是財富的表徵。任何人擁有社會剩餘的支配權不僅可以提高經濟生活的安全度，藉由財富也可以支配他人的勞動，藉之保障並提高自己的生命及財產的安全。因此，擁有剩餘的主張權與分配權，不僅增加財富，也提高了自己的權力，而權力的增加也影響了財富的分配，權力可以鞏固、加速財富的累積。而在剩餘分配權的爭奪過程中，爲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個人與個人間自由結盟出現，形成利益共同體，以團體力量打擊個人，利益團體彼此分庭抗禮。如果這個社會維秩序獲解決紛爭的威權制度不是自外於人群的風俗或獨裁者，而有管道容許個人或團體參與其威權規則的制訂，此時擁有財富及權力的個人或團體便會透過這個管道，以其所擁有的財富及權力去影響社會的制度，藉以影響財富及權力的分配。

因此，一個社會在「剩餘的支配權歸誰所屬？」以及「剩餘的支用對社會整體的發展有何影響？」等議題變成公共議題後，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才有可能出現。剩餘的支配權及其衍生

嚴格禁止民眾借貸取息，視收取利息爲乘人之危的高利貸行爲，亦不允許追求利潤的商業活動存在。

出之支配權爭奪衝突，反映的是社會權力關係（social power relation）的動態互動，這個互動不僅關係到社會的安全，也顯現權力與財富分配、權力與財富累積的互動關係。

因此，從個人的生存推論到群體的生存，政治經濟學研究討論的是一個社會基本生活需求滿足後的權力、財富與安全的三角互動關係，以及制度（包括國家或政府）在此一三角互動關係中的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簡而言之，以現代的社會架構來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生存所需物資的生產，以及財富累積與分配問題的學問。其研究焦點為財富的創造、使用與累積的現象、財富與權力分配的衝突、政府在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財富及權力分配關係的探討等議題。

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客體：現象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體既然是人生存活動的現象，我們要問：現象因何出現？何種力量或因素導致現象呈現目前的面貌？研究該現象所需具備的知識或工具為何？

任何現象成為研究的焦點，必須滿足兩個條件。首先，該現象必須已經是普遍的社會現象，其所呈現的樣貌亦有足夠的資料可供觀察研究其因果關係，以演繹推導出普遍化的法則；其次，儘管已有足夠的客觀資料可供研究，而研究者應該具備研究所需的知識，嫻熟掌握研究工具及方法。

研究所需的知識與方法，是社會長期進化所累積的知識資產，非研究者與生俱來的天賦，研究者之所以具備使用該研究工具能力，是後天訓練所得。因此，任何研究者均應瞭解其所受之研究方法訓練，對他個人而言可能是資產，但也可能是其必須克服的限制。

任何現象的研究，免不了對現象的變化作演繹分析，此一演繹分析過程包括：（1）現象因果關係之假設；（2）因果邏輯之建立，對事件之發展成立邏輯嚴謹之推論；以及（3）就事

實資料驗證邏輯，確定或修正邏輯。有方法固然重要，但使用「對的方法」來做研究更是成功的研究之所不可或缺。¹²對事實探討的邏輯過程，可能因為訊息的不完整或觀察的不周延，發生非因說因、非果說果、倒果為因或導因為果的謬誤。即或做出有意義的結論，其對事實現象之推論，亦有「實然」（positive）與「應然」（normative）之區別。研究者對複雜現象所做「實然」或「應然」的結論，有時反應其受後天環境薰陶的價值取向，有時也反應其研究方法的限制，因而結論不夠客觀，或者因此產生偏誤。

因此，對現象所傳遞訊息接收的敏銳度固然是研究者應該具備的特質，然而敏銳不應與熱情充沛劃上等號，對人的問題關心，敏感而不帶私人的情感與價值觀來對現象作分析，是研究者在方法之外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

三、現象分析：以新政治經濟學為例

近代政治經濟學關心的是公共經濟政策相關的議題，是對利益團體、政治力量與經濟政策間的互動的研析。公共經濟問題的分析離不開政治力量與經濟問題的糾葛，因此從因果關係來看，到底是經濟影響政治，或者是政治影響經濟現象的結果，是雞生蛋或蛋生雞的無止境邏輯糾纏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2000年前後美國學界開始出現所謂「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見 Drazen, 2000; Persson & Tabellini, 2000）。在此對其做簡單的介紹，作為探討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之參考。

新政治經濟學之研究取向主要是探討經濟與政治的相互影響對經濟現象的影響，基本上接受經濟學理論所稱，有限的

¹² “Sciences have been created and revolutionized by those who have not stopped to analyse their own methods of enquiry. Still, their successes must be attributed to their having employed the right method.” (Menger, 1985: 5).

資源可以在各種不同的用途去做選擇的前提，但不認為市場的價格機能是決定資源最適配置的機制，而主張資源既屬有限，配置的抉擇必然牽涉到許多不同利益的衝突問題，因此資源配置是政治問題，不是市場機能的效率問題；一個經濟體的政治制度特質，是影響有限資源配置的關鍵因素，也是影響經濟結果的關鍵因素。其對問題研究的邏輯過程，可以簡單舉例說明如下（Drazen,2000: 1-18）：

- 一、什麼是經濟問題？處理當前經濟問題的政策所遭遇的限制是什麼？
- 二、各種不同的利益衝突如何顯現在此一問題的處理上？此一利益衝突引生何種問題？
- 三、在多元而歧異的利益紛爭關係中，不同的個人或團體各自有其利益考量，面對利益的衝突，這個社會如何形成其集體的政策選擇？
- 四、在現有的社會架構中，個人、階級或團體如何獲取權力或影響力，以使整個社會的決定朝向其所主張的利益方向？
- 五、對前述利益衝突與紛爭現象，政治學、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選擇理論能夠提供什麼樣的答案？

對問題的分析邏輯上，新政治經濟學者的推論相當嚴謹，而在研究方法上，他們使用了大量經濟學的實證方法及實證模型來檢驗其邏輯推論，這在政治學的研究上是一種新的風潮，而在跨科技整合上，也是一種值得努力的嘗試。

肆、結語

政治經濟學是對人類生存現象的研究，對任何現象的研究，應該瞭解其最終目的在於對人的關心，在於探索財富如何影響社會的存續與演化，研究的目的絕對不能侷限於現象本身的瞭解而已，否則終將無法貼近現象背後的真相，且極易流於玩弄邏輯，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或人群問題的解決將難有所貢

獻。

本文從人類的生存活動來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儘管人類生活的時空背景因素不盡相同，但基本生存的滿足是亙古時空的人類基本需求。基本生活無虞後，求安全、求延續、求壯大等需求乃相續出現，爲了生活的安全，要累積物質的供應，追求物質財富的累積成爲很自然的生命活動的目的之一；爲了生命的安全，必須具備防衛的力量，而武力或權力是一種可以滿足安全需求的力量。財富可以購買權力，累積財富後透過適當的途徑也可以達到累積權力的目的；而權力的累積可以增加對許多事務的影響力，透過此種影響力也可以達成其經濟利益追求及財富累積的目的。不論財富的累積或權力的累積的追求，目的都在增加生命的保障，而在一個現代社會中，個人或團體累積財富或權力後，以手上的財富或權力增加其對公共事務或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藉此影響社會財富或權力的分配，偏向有利於自己的分配，達到增進自身利益、鞏固財富及權力的目的。

本文以人類社會的生存活動爲主軸，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本質，認爲作爲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社會，必須已有能力產生社會剩餘，而且該社會的個人對組織生產的方式及支配產出的方式均有表達其主張的管道，而對產出的分配亦有決定權之時，才會出現前述求活、求安、求延續、求壯大等需求所產生的權力累積與財富累積的追逐，並以財富及權力來造成有利於己的分配行爲，而這些行爲的分析，即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本質。

參考文獻

- Marshall, Alfred. (19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891.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8th (Ed.).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Marshall/marP.html>)
- Blaug, Mark. (1985).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4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nterbery, E. Ray. (1995). *The Literate Economi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Clark, Gregory. (2001). "Land Rental Values and the Agrarian Economy: England and Wales, 1500-1912."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gclark/papers/rentereh.pdf>)
- Dobb, Maurice. (1945).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 Drazen, A.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ärtner, M. (2000). Political Macroeconomics: A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4(5), pp. 527-561.
- Hausman, Daniel. (1992).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lbroner, Robert. and William Milberg. (2001). *The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11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Keynes, John Neville. (1890).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Batoche Books.

- (<http://socserv2.mcmaster.ca/~econ/ugcm/3ll3/keynesjn/scope.pdf>)
- Landreth, Harry. and D. Colander. (2002).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4th Ed.), Princeton, N.J.: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Longfield, Mountifort. ([1834] 1996).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Reprinted. London: Thoemmes/Routledge Press.
- Marx, Karl. A (1970).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 W. Ryazanskay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McNally, David. (1994).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Re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nger, Carl. (1985).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ed. Louis Schneider, trans. Francis J. Noc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ill, James. (1844).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3rd (Ed.).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mill-james/>)
- Mill, John Stuart. (1844).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arker.
(<http://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ll3/mill/Questions.pdf>)
- Mill, John Stuart.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2 volumes. London: Parker.

- ([http://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ll3/mill/p
rin/index.html](http://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ll3/mill/p
rin/index.html))
- Nagatani, K. (1989). *Political Macro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ters, J.P. (1998). “An Economic Model of Political Decision - Making.” McGill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51*.
- Palmer, R.R., Joel Colton, and Lloyd Kramer. (2002) .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9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2000.) *Political Economy: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2000) .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Taylor, J. and M. Woodford (Eds.) ,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NBER Working Paper No. 6329*) .
- Ricardo, David. (1817) . *On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Ricardo, David. (1891)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ited by E.C.K. Gonner. London: George Bell. (<http://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ll3/ricardo/prin/index.html>)
- Roll, Eric. (1938).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Faber & Faber.
- Rousseau, J.J., *A 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 (1775) . <http://www.constitution.org/jjr.polecon.htm>.1954.
- Sayer, S.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4 (5) , pp. 513-526.

Smith, Adam. (1776) .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On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69) . *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 (1976) .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網路資料：

www.byu.edu/ipt/projects/middleages/LifeTimes/Plague.html

www.britannica.com

www.ex.ac.uk/~ajgibson/scotdata/prices/edstat2.html

www.iisg.nl/hpw/dover.html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Economy

Yuan-Ho Hsu*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 This essay first traces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n proceeds to discuss how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re intertwined.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Income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Methodology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